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当代发展
从总体脉络到诸领域的深入
本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
为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主编 唐小林 饶广祥

当代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思潮文选

Marxist Semiotics Today: A Selection

胡易容 陈文斌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当代发展

从总体脉络到诸领域的深入

本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

为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主编 唐小林 饶广祥

当代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思潮文选

Marxist Semiotics Today: A Selection



胡易容 陈文斌 主编

藏书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Marxist
Semiotics Today: A Selection / 胡易容, 陈文斌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 唐小林, 饶广祥主编)
ISBN 978-7-5690-0057-3

I. ①当… II. ①胡… ②陈…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744 号

书名 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
Dangdai Makesi Zhuyi Fuhaoxue Sichao Wenxuan

主 编	胡易容 陈文斌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057-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9.5
字 数	34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 / (028)85401670 /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总 序

随着人类进入全面符号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必然是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些人的迷思，也不是振臂一呼心血来潮的产物，完全是时代大潮使然。

科技拜物教，创新神话，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超常融合发展，未来5至10年，人类社会将以难以预料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全面卷入智能时代：人类自然演化的历史行将终结。万能基因剪刀，可以无中生有任何事物，包括人类自身。3D打印机任意挥洒想象，塑造世间万物，定制人间万象。万灵的感应器，替代人类全部触觉，海阔天空，上天入地，没有任何障碍，无人驾驶比有人驾驶更加安全。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可穿戴设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参与决策、比特币和区块链共谋、智慧城市，再加上万物互联，人类世界正被彻底改变。人类不再是单方面使用符号的动物，而是符号使用的动物。人类被自己的所造物——符号世界所围困。2016年，围棋九段世界冠军李世石被机器人阿尔法围棋战败，只是一个颠覆性时代到来的预言。

符号学在世界东方的时兴不是时髦，而是被符号化的时代所唤醒，为窘迫的现实所催逼；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不是应景，而是它的实践品格和未来朝向，使它没有理由放弃对我们当今和即将面临的时代的解释权。面对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后果，经典马克思主义响亮地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余音未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啸而过。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集结号下，竟然是智能人与自然人的合作或对立，人在与智能合体之后，如何实现自身的救赎，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耸人听闻，人类转型的巨大力量和超级速度，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正视。习以为常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盲目自信，使我们对身边瞬息万变的一切懵懂无知、措手不及。人类高傲的头颅，正在使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面对被符号泛滥甜蜜地淹没的事实，人类越来越丧失面对现实和眺望

未来的能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首篇，把商品作为符号，符号就已经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事实上，任何商品生产都是物性劳动和智性劳动的结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已内蕴符号价值。当且仅当智性劳动一端在商品生产中迅猛发展，直至一家独大的时候，信息社会、智能时代就已不可避免地到来。符号价值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商品增殖部分，它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内在要素，是构成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们所说的拟真、象征交换等，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从来就不在实在世界之外，恰恰是它们构成了实在世界本身，是对这个实在世界基本特征的指认。用“物质/文化”或“文化/经济”二元论，说不清楚商品和社会问题。要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分析。

说到底，信息社会一切看似玄而又玄的现象，只有回到对经济基础和商品社会的透彻分析才能解决，才能得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好像又走偏了路子。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国。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中国有了一个战斗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太多的矛盾与纷争，到如今我们仍然面临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构建一个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号召力和生命力，是因为它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思想基础和学术基础，它是建立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彻洞察、对人类未来走向的清晰判断之上的。它是基于马克思对人类全部知识、文明和思想成果的毕生探究，基于马克思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施蒂纳、蒲鲁东、赫斯、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思想者的反复论辩。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恰恰缺失这一重要的基础，往往流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空洞说辞。斯大林时代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基础，不仅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没有关系，而且与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也有霄壤之别，更不必说对网络时代媒介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商品形态进行缜密分析。丝毫不接地气，也不与时俱进，缺乏知识性、学术性支撑，拒绝与同时代思想交锋，对于亲见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或者毫无解释力的学说，单靠话语传声筒的力量，如何征服人心？意识形态空心化，显然与当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术知识空心化密切相关。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葛兰西到第二代的阿尔都塞，到第三代的普兰查斯，再到第四代的拉克劳和墨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已被翻转。意识形态逻辑不再决定于基础逻辑，而是成为基础逻辑本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成变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成”。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从话语开始到话语结束，从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终，马克思主义变成单纯的话语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商品分析的放逐，对“经济主义的马克思”的背离，不仅使社会关系隐匿不见、模糊难辨，也使人类的未来暗淡无光。为批判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正在走向穷途末路，那就是正在演变为学术表演。

符号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处理符号的经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会处理符号问题，而不能局限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眼光。符号劳动是商品生产的内在构成要素，符号价值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石。要处理好符号问题，只有回到经济基础、商品分析。符号从来就不是什么异己力量，学会重视符号、善待符号、理解符号，才能充分开掘和发展符号生产力，才能从被符号奴役的困境中取得主动，实现突围，获得人类的再次解放。而一旦无视事实，把符号视为社会的冗余，文化的毒瘤，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时代发展的洪水猛兽，符号就会被异化，反过来又形塑和异化人类社会。为符号正名，为符号社会立法，重建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现实维度，构建一个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的学术使命。

回到经济基础，回到商品分析，回到社会关系，回到未来朝向，这是我们构建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即便这一天就在眼前，一个自然人、机器人、智能人并存的世界，而人类依然能够诗意地栖居，能够与自己的所造物、与无所不在的符号和谐共处，共同奔赴美好的未来。老实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术期待，如此简单，如此辽远，而又如此未知。

目 录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总体发展状况

1. 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5)
 - 第一阶段：经济基础/上层结构翻转 (7)
 - 第二阶段：意识形态逻辑吸纳政治逻辑..... (10)
 - 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政治逻辑吸纳经济基础的逻辑 (14)
 - 第四阶段：所有领域消失在话语中..... (18)
 - 结 语..... (24)
2. 卡尔·马克思的符号学 (26)
 - 马克思式的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26)
 - 巴赫金小组在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方面的贡献..... (29)
 - 罗西-兰迪在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方面的贡献 (33)
 - 亚当·沙夫在批判符号崇拜方面的贡献..... (38)
 - 结 语..... (39)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符号学

3. 文化差异、语言、理论与与激进政治的三个方案 (48)
 - 引 言..... (48)
 - 批评与替代方案..... (49)
 - 意识形态与理性批评..... (52)
 - 语言、交往与马克思主义..... (55)
 - 重返“物质”：模仿、认同与承认 (57)
 - 结 语..... (63)
4. 从商品生产到符号生产：马克思符号学 (65)
 - 引 言..... (65)
 - 商品作为一个符号：一个简要的概述..... (67)

建立一个商品生产模型.....	(69)
一个符号生产模型.....	(79)
结 语.....	(84)
5. 商品的符号学本体论	(87)
主要论点.....	(87)
符号学预备知识.....	(90)
分类的应用.....	(94)
结论：通约是适合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	(113)
6. 金钱说了算，但是它在说什么？货币符号学和社会控制	(115)
符号学.....	(116)
符号学和货币.....	(118)
奥地利学派的符号学应用.....	(118)
制度经济学派的符号学应用.....	(122)
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应用.....	(124)
结 语.....	(130)
7. 批判性符号学分析和文化政治经济学	(131)
关于文化政治经济学.....	(132)
符号学和结构选择的辩证逻辑.....	(136)
将批判性符号学分析整合进政治经济学中.....	(140)
结 语.....	(145)

第三部分 马克思主义文化、历史与社会符号学

8. 符号学与物质事物的社会分析	(154)
让符号回归其物质世界.....	(157)
外在冲突.....	(158)
感觉品质 (sensuous quality)	(160)
指示 (pointing) 与因果关系	(162)
从符号解释到符号意识形态.....	(165)
符号意识形态与社会物的结合.....	(168)
对象化、历史性与社会分析.....	(171)
9. 符号学与历史：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174)
认识论范式.....	(174)

历史：认识论和理论·····	(181)
符号学和历史·····	(187)
10. 非物质劳动的纲领化·····	(199)
共同行动·····	(203)
网 络·····	(204)
分配政治学·····	(205)
平 等·····	(208)
社会主义纲领·····	(210)
11.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意识形态与主体历史·····	(212)
符号与社会现实·····	(212)
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214)
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	(216)

第四部分 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符号学

12. 受难者符号学·····	(226)
作为像似符号的受难者·····	(228)
作为规约符号的受难者·····	(231)
人文需求及正义·····	(234)
权威人士·····	(235)
作为指示符的受难者·····	(237)
谁是解释项？·····	(239)
作为鼓手的受难者·····	(240)
结 语·····	(241)
13. 符号链：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性 形象·····	(243)
14. 爱丽丝世界中的交换·····	(258)
15. 帕索里尼的电影《乞丐》与下层阶级状况 ——一种异端符号学·····	(264)
参考文献·····	(272)
Marxist Semiotics Today: A Selection ·····	(300)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总体发展状况

马克思主义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主张看上去存在明显分歧，即使在索绪尔时代，也有不少学者努力融合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后结构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符号学的社会文化向度有更多的呼应。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哲学倾向，既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对语言转向的一种回应，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与符号学共通性的显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向来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指向，而作为意义之学的符号学亦同样具有内在批判性。因此，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可能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契合。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已经在当代学术发展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两者结合推动了对当今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研究，如：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形式论被重新发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霍尔的文化解码理论、霍基等的社会符号学、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博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都是这种结合的成果，而本书试图向读者介绍更多的欧美学者在近年做出的工作，以资借鉴。

学术常常跨越式地前行，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尤其如此。这种前行模式既包括马克思对此前理论的处理，也包括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在与文化符号理论融合时，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21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实中，这些不同声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的基本语境。当前信息内爆和互联网革命使得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有更加深入的互相渗透。基于文化符号政治与知识经济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重铸符号学。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是符号学的文化维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更深刻的融合。这种融合的结果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符号学”。它同时也是当代数字新媒体语境下的社会文化，以及“知识信息型”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

为了呈现这种融合及其路径，第一部分的选文正是这种提纲挈领式的呈

现,力图展现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潮状况。两篇文章恰好构成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关系发展的两个不同理论演绎逻辑: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经历了背离与回归的发展逻辑;后者则直接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思想出发,指出其作为“未亮明身份符号学家”的隐含理论逻辑。

伯吉森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一文,围绕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的核心要素——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展开,其展开的线索则是整个理论思潮时代变化——从结构主义的经典层级结构到后结构主义的边界融合。这个逻辑更多的是社会学运行逻辑。

另一篇文章,庞齐奥的《卡尔·马克思的符号学》是从符哲学方向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上一篇的补充。此文重点论述的是在思想流派以及学理逻辑上的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联系。作者指出,符号学作为中立理论工具应当免受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影响,这样一种观念是错误的。作者援引西比奥克所说“卡尔·马克思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家’”,并提出马克思具有符号学特质的两个原因:其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理解为“商品语言”的符号学解读;其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与符号系统的等级分层和意义结构相关。

上述两篇文章立场视角的差异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和思考的自由。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对商品交易逻辑及剩余价值的逻辑的揭露具有某种话语斗争性质,并进而认同马克思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家”,那么就需要重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未曾言明的意涵。这一未曾明言的意涵乃是这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逻辑从未外在于政治逻辑或国家意识形态层面。若仅仅是在经济斗争的现实政治需求中看待这些要素之间的决定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被政治需求狭隘地工具化了。

这两篇文章何者更具说服力,恐怕只能交由读者来判断。但它们均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这两种理论思潮在新时期的融合——一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潮的兴起。本书初步尝试介绍欧美学界这一学术潮流,篇幅有限,只能是举例说明,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对于欧美各家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书主要是介绍,供中国学界参考。

我们会继续这个序列的编辑出版。西方学者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分析对象以及所持立场,不可能照搬挪用。相反,我们希望下一步对他们的理论观点,能以我们的眼光展开深入的剖析,探索批判的途径。因此,本文选希望得到眼光更远、理论修养更深的前辈与同行的批评帮助。

1. 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阿尔伯特·伯吉森 著

胡光金 译

本文阐述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的一种新方向的四个不同阶段。这一新方向可称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其主要设想是翻转经典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逻辑，即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是决定性关系。本文通过阐释每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逻辑来展示这四个阶段中的渐进演变关系。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四个阶段是：（1）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逻辑的早期翻转（葛兰西）；（2）意识形态逻辑向下扩展，与政治逻辑融合（阿尔都塞）；（3）融合意识形态/政治领域逻辑后继续向下扩展，以吸纳经济领域逻辑（普兰查斯）；（4）将曾经由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重铸为由主体身份之间语言关系构成的新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话语构成”（拉克劳和墨菲）。

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被翻转。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见证了一系列理论的兴起，这些理论不仅力图颠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还进一步认为，上层建筑（如意识形态和语言逻辑）是整体社会构成的逻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述，见：Anderson 1976, 1983; Carnoy 1984; Boswell et. al 1986; Wood 1986; Alexander 1982; Szymanski 1987; Aronowitz 1982; Geras 1987; Thompson 1984）。为了区别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采用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①，因为它反映了文化要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比如：信仰和共享的世界观（Gramsci 1971; Burawoy 1979）、文化（Nelson and Grossberg 1988）、意识形态（Althusser 1971；

^① 最近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趋势是“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其主张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see: Przeworski, 1985; Elster, 1985; Roemer, 1982, 1985; Wright, 1985; Wright, Levine, and Sober, 1992; Burawoy, 1989）。（原作者注）

Poulantzas 1978; Larrain 1986; Thernborn 1980)、语言 (Coward and Ellis 1977) 以及话语 (Laclau and Mouffe 1985; Ryan 1982)。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审视自葛兰西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关系的转变,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变化。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变化的四个不同阶段,从经济基础决定论起,到上层建筑决定论止。每个阶段通过讨论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阐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转变方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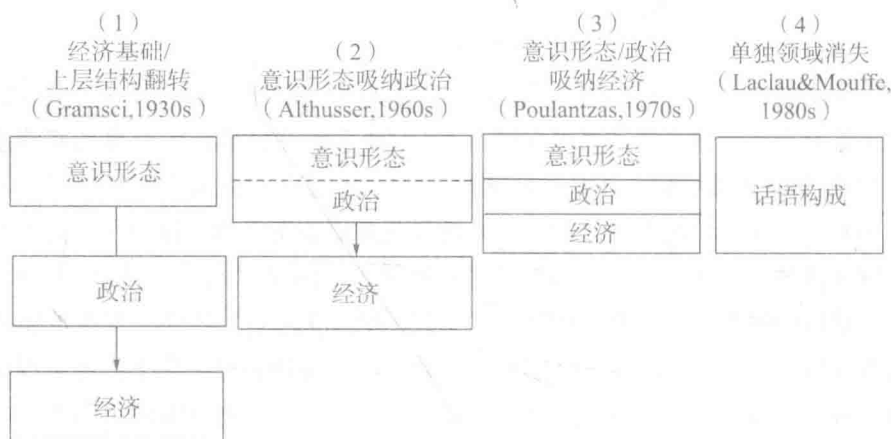


图1

第一阶段,代表人物葛兰西 (Gramsci 1971)。此时,共享的世界观决定国家宰制权,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基础/上层结构模式翻转。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包含的远不止经济基础与上层结构的翻转。第二阶段,代表人物阿尔都塞 (Althusser 1971)。意识形态领域逻辑向下扩展,吸收了国家的逻辑,创造了他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即意识形态与政治相融合为同一场域。

在此,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首先,非意识形态领域的逻辑弱化并向意识形态倾斜;其次,伴随非意识形态领域因果分析的衰弱,政治和意识形态理论逻辑融合。意识形态逻辑不再像早期葛兰西理论中那样决定政治形态,而是吸收了政治形态逻辑。尽管这个新融合的意识形态/政治范畴,仍然对经济有决定作用,但是连这个区别,后来也逐渐消失。

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普兰查斯 (Poulantzas 1978)。意识形态国家与经济的统一得以理论化。经济基础被吸纳进上层建筑,理论上成为一个整体。

意识形态不再决定政治或经济，而是成为它们的一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实上已经超越经济基础/上层结构的翻转模式。各领域间因果关系消失，能指间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逻辑理论化为阶级关系逻辑。意识形态逻辑不再决定基础逻辑，而是成为基础逻辑。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成变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成”，代表人物为拉克劳和墨菲（Laclau & Mouffe 1985）。下文阐释图1所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基础/上层结构翻转

第一阶段的理论转变指经济基础/上层结构模式的翻转。这一翻转通过改变文化、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因果秩序来实现。葛兰西（Gramsci 1971）明确声称，共享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十分重要，它像新的黏合剂一样，将社会要素黏合在一起。之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葛兰西对经济基础/上层结构模式的翻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前者（经济结构）是首要的主导因素，后者（上层建筑）是次要的从属因素……在葛兰西那里，则正好相反。”（Bobbio, 1987: 151）佩里·安德森也注意到，“在葛兰西的用法里，宰制权意味着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受资产阶级控制，而资产阶级通过意见一致来实现统治”（Anderson 1976—1977: 26）。

权力和控制不再来源于经济基础及其动力，也不再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而是源自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此刻，国家不再是“武力”和“胁迫”的机器，而是“道德”和“文化”的化身。国家创造了“被统治者的一致看法”，“这种一致看法（是）被精心组织的，而非一般化的或模糊的”。（Gramsci 1971: 259）正是对一致看法的编制和生产，把国家从原先的强迫装置重新定义为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协会以及教育实践。这扩展了国家的职能，且是一条双向通道。不仅赋予传统上不属于国家领域的各个机构以重要性，更是让这些机构的文化职能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也即，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文化职能相连——立法、社会化、维持道德秩序——它们成为葛兰西所说的国家职能。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是社会化和文化传承和传播世界观及意识形态的工具。简言之，“整个国家的职能都变成了‘教育者’的角色”（Gramsci 1971: 260）。对葛兰西来说，旧观念中“国家警察……职能限于保卫……公

众秩序〔掩饰了实际情况〕^①，在形式制度里（作为限制性的假设，从来没有在文件之外真正存在过）属于私有力量的宰制权，经过历史发展，在公民社会也是一种‘国家’的力量，且就是国家本身”（1971：261）。

我们首先弄清这里的意思。国家权力，作为武力和暴力，取决于公民社会普遍赞同这个基础，准确地说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这便是葛兰西式的翻转：信仰、一致看法和赞同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而非相反。

应该注意，葛兰西既谈到了国家的强制性，也谈到了国家的认同性。国家仿佛一个双面体，武力和认同是它对等的组成部分。仔细审视，却会发现它们并不真正对等。因为葛兰西的学说是“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后者〔强制的盔甲〕能够暂时消亡”（1971：263），也就是说，强制性方面居于次要地位，是可以省掉的。“受约束的社会（或伦理国家或公民社会），组成部分越来越显而易见，因此可以认为国家的强制部分会逐步消亡。”（1971：263）根据这个逻辑，认同的基础会加强，而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会下降，直到成为“没有国家的国家”。国家职能现在被意识形态和公民机构的社会化进程所消耗。“国家是一个复杂体，由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组成，统治阶级不仅用它来证明自己合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还用它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一致看法。”（1971：244）统治现在被认为是生产一致意见，也即，生产信仰、同意、理解以及各种理所当然的假设。国家是阶级国家，只是阶级统治已经转变成由“政治和文化宰制权机器”（1971：259）创造、维持，并实现再生产的阶级认同。

具体来看，阶级统治是如何通过理念和世界观成功实现统治的呢？一种方法是让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被理解为所有阶级的利益。这一信念一旦成功，该阶级就继续拥有特权位置，而其他阶级则认为这是一种常态，且是他们可以渴求的一种常态。“资产阶级将之写入法律，继而写入国家职能的革命中，更是包含了共同意愿……”（1971：260）

“共同意愿”是如何产生的？国家为“大众的‘自发’赞同而进行最周详的准备，大众则需要指令中‘生存’；他们改变习惯、改换意愿、更改自己确信的事情以使得自己试图实现的目标与被给予的指令一致”（1971：266）。那么又是什么造就了“习惯”“意愿”“确信的事情”，造就了“大众的赞同”？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吗？是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吗？不是。理论

^① 中括号单列时，括号内为原作者对引言的补充，后文同。